

# 戰後基督教高等教育在香港的傳承： 崇基學院的個案研究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

## 【摘要】

崇基學院於 1951 年在香港創辦，目的是面對共產政權統治中國大陸後，期望延續在華基督教高等教育的使命。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崇基學院成為中文大學的創校書院，併入了公立大學的體制。本文旨在以崇基學院為個案，探討以下兩個問題：（一）崇基學院在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從私立基督教大學到加入公立大學，期間對基督教大學精神的理解；（二）在這個過程中，神學教育在崇基學院的發展及演變。通過梳理上述問題，有助我們檢視基督教大學在時代變遷中面對的挑戰。

## 一、前言

1949 年中共建國，不僅改寫了中國當代歷史的發展，對中國及香港基督教而言，也帶來重大及深遠的影響。隨著中共執政，基督教被指控為帝國主義侵華工具。在華基督教高等教育首當其衝，在 1950 年底受到反美帝文化侵略運動的嚴重衝擊。

1949 年，香港也因著中國政局變革而面對重大考驗。當時，大量中國難民南下，以這個英屬殖民地作避秦地。其中不少知識分子及教育界人士，紛紛在港辦學，在極艱難的環境下興滅繼絕，草創「難民學府」(refugee college)。其中較著名的，有新儒家學者錢穆等，為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而在 1949 年創辦新亞書院。1951 年，基督教人士也在香港成立崇基學院，期望能延續基督教在華高等教育的傳統。1963 年，香港殖民地政府開設第二所公立大學，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加入了香港中文大學作成員書院，為香港高等教育史揭開新的一頁。

本文以崇基學院為個案，探討這所被視為「自由亞洲地區首所為華人而設的基督教高等學府」，<sup>1</sup>如何在時代轉變中探索及實踐其使命。五十至七十年代，崇基經歷了從草創到發展，從私立基督教學府到成為公立大學的成員的歷程。本文會循兩方面展開探討：（一）

---

<sup>1</sup> “Chung Chi College Special Bulletin,” March 1955. Box 2, Folder 21, Sidney R. Anderson Papers (RG200),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鳴謝洪善丰提供資料。

崇基學院在發展過程中對基督教大學精神的理解及實踐；(二)神學教育在崇基學院的演變。通過梳理上述問題，有助我們檢視基督教大學時代變遷中面對的挑戰。

## 二、冷戰時期基督教高等教育在香港的延繼

### (一) 連根拔起：中共建國後基督教大學的命運

1949年1月，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托事部(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決定以積極及勇敢的政策(a positive and courageous policy)來回應中國變局。<sup>2</sup>其公開聲明指出：只要在華基督教大學能按其基督教宗旨工作，托事部將繼續提供全面支持。<sup>3</sup>托事部出版的*China Colleges*，每期都報導解放後各基督教大學的情況。<sup>4</sup>1950年5月，托事部在紐約召開年會，明確表示即使在華基督教大學以共產學說為必修課，基督教辦學的理念受到威脅，但考慮到官方仍未有廣泛干涉校務，加上各校的基督徒同工竭盡所能維持有關理念，故決定繼續資助中國的基督教大學。<sup>5</sup>11月，中美關係因朝鮮半島戰爭問題惡化，但托事部表示已收到3所大學校長於10月19日發出表明仍能接受海外津貼的電報，故決定繼續匯款。<sup>6</sup>即使美國政府於12月宣佈實施對華經濟禁運，托事部仍向美國政府申請匯款到中國的特別許可。<sup>7</sup>

1951年1月16日至22日，教育部召開處理接受外國津貼高等學校會議。出席會議者包括華東、中南、西南各大行政區教育部或文教委的負責人和全國接受外國津貼的19所高等學校的董事長、校長及教師、學生代表85人。<sup>8</sup>教育部長馬叙倫在會議開幕時指出，教會學校是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重要活動。針對美國凍結中國在美資金財產，政務院決定接收國家教育主權，把原來接受美國津貼的高等學校，變成中國人民自己辦理的學校。他批判教會學校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要途徑，「傳播親美、崇美、恐美的惡毒思想，鼓吹

---

<sup>2</sup> “R. J. McMullen letter to Friend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 20 January 1949. 信函附於 *China Colleges* XVI: 3 (Feb. 1949).

<sup>3</sup> “A Statement of Policy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in *China Colleges* XVI: 3 (Feb., 1949): 2.

<sup>4</sup> “Christian Colleges Open for Fall Semester; All are Carrying on Their Regular Work,” in *China Colleges* XVII: 1 (Oct. 1949): 1-2. “Recent Cables Reveal Only Few Changes in Christian Colleges’ Programs, Activities,” *China Colleges* XVII: 2 (Dec. 1949): 1.

<sup>5</sup> “United Board Reaffirms Faith in Christian Colleges; Call for Continued Support,” *China Colleges* XVII: 4 (June 1950): 1.

<sup>6</sup> “No Embargo on Aid,” *China Colleges* XVIII: 2 (Nov. 1950): 1.

<sup>7</sup> “Inability to Transmit Funds to China Threatens Lif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ticipate Restrictions Will be Lifted,” *China College* XVIII: 4 (Feb. 1951): 1.

<sup>8</sup> 〈教育部召開處理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會議〉，《人民日報》，1951年1月25日。19所高等學校為：之江大學、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東吳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協和醫學院、協和大學、華中大學、華西協合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齊魯大學、銘賢學院、震旦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嶺南大學。

腐朽、墜落的『美國生活方式』，妄圖摧殘中國的民族文化，戕害中國青年的靈魂」。<sup>9</sup>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陸定一在會上更把處理有關問題的本質定性為嚴重的「反對美帝的政治鬥爭」。<sup>10</sup>

教育部黨組書長兼副部長錢俊瑞在會議閉幕時指出，為了堅決肅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響，各校必須開展全體師生員工的控訴美帝侵略罪行運動。對於長期接受外國津貼的學校，一次的抗美援朝運動或一次的處理工作，根本不可能把美帝的遺毒影響徹底肅清。唯有長期的思想改造，「打掃衛生」，始能最終實現目標。<sup>11</sup>最後各教會學校代表一致擁護政府的立場及決定。<sup>12</sup>

會議召開期間，基督教大學聯合托事部給燕大校長陸志韋、齊魯大學校長楊德齋、金陵大學代理校長李方訓、金女大校長吳貽芳等發電報，表示希望於2月中在香港商討經費問題。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四位校長明白此事若處理不當，將要承擔極大的政治後果。於是向政府報告，並斥責美帝圖以金錢利誘的陰謀。<sup>13</sup>聯合托事部在1951年2月的*China Colleges*上，對在華基督教高等教育前景表達憂慮。<sup>14</sup>

與此同時，全國掀起的反文化侵略運動，對基督教教育事業構成重大的衝擊。為了從思想上「斬草除根」，教會學校師生必須參與思想教育及改造運動。據《人民教育》指出，問題並不是單純17所接受美國津貼的大學，200所左右的中學，1500所左右的小學的問題，也「不是簡單地接收過來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一場思想的鬥爭，也是廣泛的思想教育運動：

這一運動的性質是受了美帝思想影響的人的一種思想解放，目的是認清美帝文化侵略的本質；內容主要是密切結合各教會學校自己學校內美帝國主義分子對學校的控制，壓迫，以及思想上的毒素，政治上的陰謀破壞的間諜活動等具體的罪行，不是抽象的談話，或僅說一些道理；在形式上，可以多多利用控訴會，澈底揭發自己學校內部的一切黑暗；然後加以分析，提到美帝文化侵略的本質上來，這樣才可以達

---

<sup>9</sup> 馬叙倫：〈處理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會議的開幕詞〉，《人民教育》，卷2期4（1951年2月），頁5至6。

<sup>10</sup> 〈中央教育部召開「處理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教育學校會議」〉，《新華月報》，卷3期4（1951年2月25日），頁889。另陸定一：〈在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高等學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教育》，卷2期5（1952年11月）。

<sup>11</sup> 錢俊瑞：〈集中火力，肅清美帝的文化侵略影響〉，《人民教育》，卷2期5（1951年3月），頁9至11。

<sup>12</sup> 〈出席全國處理接受外國津貼高等學校會議代表的聯名宣言〉，《人民日報》，1951年1月26日。

<sup>13</sup> 〈美帝陰謀又一次破產，妄圖利誘教會學校〉，《人民日報》，1951年1月24日。

<sup>14</sup> "Inability to Transmit Funds to China, Threatens Lif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ticipate Restriction Will be Lifted," *China Colleges* XVIII: 4 (Feb. 1951): 1.

到思想教育的目的。<sup>15</sup>

1952年秋，教育部開始對高等院校作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全部教會大學均被國家接管，並與其他院校合併。教會大學（甚至整個基督教教育體系）在中國被「連根拔起」，從此成為歷史。<sup>16</sup>

## （二）四方人士，同興學府：崇基學院的草創

1951年5月，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托事部召開年度會議，議決在亞洲為華人創辦基督教大學。<sup>17</sup>當時，有消息指四所中國基督教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西協和大學、燕京大學及金陵大學）已被國家接管。<sup>18</sup>

1951年9月，崇基學院在香港宣告成立，<sup>19</sup>並於10月2日在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舉行成立感恩崇拜，10月3日正式開課。<sup>20</sup>據首任院長李應林（前廣州嶺南大學校長）憶述，崇基的創立，乃由香港教會領袖所發起。當時聖公會何明華會督（Bishop R. O. Hall）、長老會華連牧師（E. E. Walline）及聖公會信徒領袖歐偉國（前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主席）、美國衛理公會駐港代表安迪生（S. R. Anderson）等，為回應中共建國後大量難民來港，以及香港中文中學畢業生因政局而無法回中國升學的問題，決定在港籌辦一所基督教大學，以承繼「過去基督教人士在內地辦學的精神，繼續依照基督教教義來作育這一班青年」。<sup>21</sup>在崇基學院的第一份年報中，李應林明確指出，崇基學院正是要「填補」基督教大學在中國遭逢突變而留下來的「真空」。<sup>22</sup>

崇基草創之初，商借麥當奴道聖保羅書院課室上課，有學生60人。未幾，即獲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托書會提供捐助。<sup>23</sup>在崇基1951至52年度合共3.7萬美元的財政預算中，托

---

<sup>15</sup> 方直：〈認識美帝文化侵略的本質〉，《人民教育》，卷2期4（1951年2月），頁7、9。

<sup>16</sup> 邢福增：〈連根拔起——建國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的終結〉，氏著：《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2增訂版），第三章。

<sup>17</sup> “1951-52 Project Program Approved by United Board,” *China Colleges* XVIII: 5 (May 1951): 1.

<sup>18</sup>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Undergoing Changes,” *China Colleges* XVIII: 5 (May 1951): 4.

<sup>19</sup> “New Christian College Opens in Hong Kong; United Board Helps Balance 51-52 Budget,” *China Colleges* XIX: 1 (Oct. 1951): 1.

<sup>20</sup> 李應林：〈關於崇基學院〉，《崇基校刊》（下文簡稱《校刊》），期1（1951年12月），頁1。“Dedication Service, For Chung Chi College, held at Cathedr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Oct 3 1951.

<sup>21</sup> 李應林：〈關於崇基學院〉，頁1；〈何明華會督校慶日演詞〉，《校刊》，期9（1956年11月），頁2。“Chung Chi College; Maintained by Christian Circles Abroad,” *SCMP* Nov. 20 1951.

<sup>22</sup>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Chung Chi College. 1951-52,” 《校刊》，期3（1953年1月），頁1。

<sup>23</sup> 李應林：〈關於崇基學院〉，頁1。

事會捐助了 2 萬美元，成為最重要的支持者。<sup>24</sup>1952 年，商定馬料水為日後校園所在地，<sup>25</sup>並於 1954 年獲政府撥地興建校舍。<sup>26</sup>

崇基校董會主席歐偉國強調，崇基是一所「基督教學院」(Christian College)。學院的校訓是「止於至善」，出自儒家經典《大學》。歐認為，「止於至善」的精神，正好與保羅「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以弗所書》四 13b) 的精神一致。<sup>27</sup>

崇基建校之初，校董會成員悉由跨宗派的基督教人士組成(表一)，主要來自聖公會、衛理公會、長老會、倫敦會及循道會的代表。其中尤以聖公會的參與最為顯著，17 人中佔了 10 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香港聖公會幾所著名英文中學校長也是校董。這些中學一直與香港大學有密切關係，其參加崇基校董會，無疑大大提昇了崇基的地位。當時香港各私立大專院校，肯定無法與崇基校董會的陣容相比。毋庸置疑，何明華在其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歐偉國(兼主席)	太古公司副經理
華連博士 Dr. E. E. Walline (兼司庫)	美國基督教長老會駐港代表
李應林博士(兼秘書)	本院院長
何明華會督 Bishop R. O. Hall	本港會督
羅士生主任牧師 Dean A. P. Rose	聖約翰座堂主任牧師
馬田牧師 Rev. Canon E. W. L. Martin	聖士提反書院校長
英純真女士 Miss K. D. Cherry	聖士提反女書院校長
葛賓先生 Mr. G. A. Goodban	拔萃男書院校長
史伊尹先生 Mr. E. G. Stewart	聖保羅書院校長
安迪生博士 Dr. S. R. Anderson	美國衛理公會駐港代表
馬鑑教授	香港大學退休教授(曾任教燕京大學，後任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中文系主任)
胡素貞博士	聖保羅女書院退休校長
羅怡基女士 Miss B. M. Kotewall	聖保羅女書院校長

<sup>24</sup> “New Christian College Opens in Hong Kong; United Board Helps Balance 51-52 Budget,” 1.

<sup>25</sup> 〈理想的崇基新校舍〉，《校刊》，期 2 (1952 年 5 月)，頁 10。

<sup>26</sup> 謝昭杰：〈崇基十年之回顧〉，《校刊》，期 28 (1961 年 10 月)，頁 6。

<sup>27</sup> David W. K. Au, “The Case of Chung Chi College,” 《校刊》，期 6 (1955 年 1 月)，頁 14。

周默真女士	香港大學女舍監
張榮舉夫人	協恩女學校校長
舒活牧師 Rev. Frank Short	倫敦基督教會代表
顧克牧師 Rev. C. V. Cook	英國循道會駐港代表

表一：崇基校董<sup>28</sup>

創校之初，崇基最早一批老師，大多具中國教會大學的背景。茲以第一期《崇基校刊》的教職員名錄作一說明：

姓名	職務	與基督教大學及教會關係
李應林	院長	嶺南大學校長
鍾魯齋	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滬江大學國文學系主任
麥健增	經濟學系教授	曾任教燕京大學、嶺南大學
任泰	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程綏楚	歷史學講師	匯文大學（燕大前身）畢業
蘇道榮	數學講師	曾任教嶺南大學
張榮岳	主任牧師	聖公會聖士提反堂主任
謝昭杰	註冊主任	嶺南大學總務長
王相廷	會計主任	
布克禮 Harry A. Brunger	兼任人生哲學講師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顧問幹事
安迪生 S. R. Anderson	兼任人生哲學講師	美國衛理公會駐港代表
李應彪	兼任人生哲學講師	任教香港聖保羅書院
張綠蕓	兼任人生哲學講師	廣州協和神學院畢業

表二：早期教職員<sup>29</sup>

<sup>28</sup> 〈本院校董姓名及現職〉，《校刊》，期2（1951年5月）。

<sup>29</sup> 〈本院教職員略歷介紹〉，《校刊》，期1（1951年12月），頁4至7。

學生方面，根據 1951 至 52 年的年報，共有 82 名學生。其中 57 人（70 %）是來自中國的難民學生（refugee students），而基督徒及天主教徒分別有 46 人及 3 人（合共 60 %）。<sup>30</sup>到 1955 年，全院學生有 331 人，基督徒及天主教徒分別有 177 人及 7 人（合共 55.5%）。

31

在艱難環境中創辦的崇基，漸漸成長。1952 年夏，除了聖保羅中學外，又先後新增了聖約翰座堂副堂及堅道校址。<sup>32</sup>1953 年 6 月，崇基正式獲教育司署核准註冊，由最初暫以夜校名義註冊，改為正式日校。<sup>33</sup>同年，再獲何明華支持，在鐵崗聖保羅堂附近興建三層洋房，租予崇基使用。<sup>34</sup>1954 年 3 月，校舍啟用，並舉行霍約瑟堂奉獻典禮，由何明華主講。

35

1954 年 8 月，李應林院長病逝，由校董會主席歐偉國任代院長，至 1955 年 2 月凌道揚出任院長。1955 年 7 月，舉行第一屆畢業禮，1956 年 11 月，馬料水校舍落成，由港督葛量洪主禮及獻詞。<sup>36</sup>

1959 年夏，凌道揚宣佈正考慮香港政府的建議，崇基是否加入第二所公立大學。<sup>37</sup>同年 7 月，崇基與新亞及聯合成立統一招生委員會，舉行統一新生入學試。<sup>38</sup>1960 年，容啟東就職校長。1962 年，崇基禮拜堂落成。<sup>39</sup>1963 年，崇基獲香港政府教育署核准立案為合格專上學校。<sup>40</sup>同年，香港政府成立第二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成為三所創校書院之一。崇基正式由私立基督教大學，變成公共大學的一員。

---

<sup>30</sup>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Chung Chi College, 1951-52,” 2-3.

<sup>31</sup> “Background of Students,” 《校刊》，期 6（1955 年 1 月），頁 6。

<sup>32</sup>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Chung Chi College, 1953-1954,” 《校刊》，期 6（1955 年 1 月），頁 1。

<sup>33</sup> 〈本院註冊〉，《校刊》，期 4（1953 年 6 月），頁 8。

<sup>34</sup> 〈本院擴充校舍〉，《校刊》，期 4（1953 年 6 月），頁 8。

<sup>35</sup> 何明華：〈崇基學院——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霍約瑟堂奉獻典禮演講詞〉，《校刊》，期 6（1955 年 1 月），頁 5 至 6；“Chung Chi College, Opening Service held at New Premises, Address by Bishop Hall,” *SCMP* March 5 1954.

<sup>36</sup> 〈校聞紀要〉，《校刊》，期 10（1957 年 3 月），頁 14。

<sup>37</sup> 〈崇基第五屆畢業典禮凌院長演詞〉，《校刊》，期 20（1959 年 7 月），頁 1。

<sup>38</sup> 〈院務概況〉，《校刊》，期 21（1959 年 10 月），頁 17。

<sup>39</sup> “Dedication of College Chapel,” 《校刊》，期 30（1962 年 7 月），頁 20。

<sup>40</sup> 〈本校已奉核准為合格專上學校〉，《校刊》，期 32（1963 年 3 月），頁 13。

### 三、崇奉基督：基督教大學精神的探索與實踐

「崇基」的命名，寓意「崇奉基督」。<sup>41</sup>在 1955 年的學院英文特刊物中，更見到在崇基學院下寫上「基督書院」(Christ College)、「自由亞洲第一所為華人而設的基督教高等學府」(First Christi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Free Asia for Chinese) 等字句。<sup>42</sup>那麼，從 1951 年創校，到 1960 年開始接受政府補助，再到 1963 年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書院，歷任院長及教會人士，隨著環境的變化，又如何探索繼承及實踐基督教大學的精神？

#### (一) 草創期：第一任院長李應林 (1951-1954)

李應林指出，崇基「以基督教教義為辦學宗旨」。<sup>43</sup>招生簡章中也強調：「本學院本基督教教義培植青年研求高深學問，溝通中西文化使其成就為有用之材，以服務社會為宗旨」。

44

在草創時期，崇基具有濃厚的基督教的氛圍。學院設校牧，首任校牧由聖公會張榮岳牧師擔任。每週規定舉行宗教崇拜，全校學生一律參加。<sup>45</sup>1952 年，學生自治會成立，並以「秉承校訓以發揚基督博愛精神，摯誠團結共謀同學間感情及福利」為宗旨。<sup>46</sup>1953 年，成立學生基督徒團契。<sup>47</sup>後來，又成立了教職員基督徒團契。

崇基學院的校歌，採用了與燕京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嶺南大學相同的曲調，再由謝扶雅在 1952 年譜上中文歌詞：

南天海嶼，四方人士，同興此學府。  
崇奉基督，勵志篤行，修業勤是務。  
漫漫長夜，屹立明燈，使命莫辜負。  
學成致用，挽救狂瀾，靈光照寰宇。

---

<sup>41</sup> 李應林：〈關於崇基學院〉，頁 1。

<sup>42</sup> “Chung Chi College Special Bulletin,” March 1955. Box 2, Folder 21, Sidney R. Anderson Papers (RG200),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鳴謝洪善丰提供資料。

<sup>43</sup> 李應林：〈關於崇基學院〉，頁 1。

<sup>44</sup> 〈崇基學院招生簡章〉，《校刊》，期 1（1951 年 12 月），頁 7。

<sup>45</sup> 李應林：〈關於崇基學院〉，頁 1。

<sup>46</sup> 鄭萼芬：〈崇基學生自治會〉，《校刊》，期 2（1952 年 5 月），頁 3。

<sup>47</sup> 〈本院學生基督徒團契之成立〉，《校刊》，期 4（1953 年 6 月），頁 7。

神州學術，源遠流長，數典不忘祖。  
自由民主，嘉誼友邦，協力相互助。  
中西結晶，增益文明，聖教宏其緒。  
濟濟菁英，天降大任，至善勉同赴。

歌詞內容宣述創校的時代使命，本著基督的精神與校訓「止於至善」的精神，融合中西學術，以發揚文化、匡時救世為己任。<sup>48</sup>

最初，崇基只有中國語言文學系、外國語言文學系、經濟學系、工商管理學系及社會學系。但所有學生均須修讀「人生哲學」，以確立基督教辦學宗旨。最早任教者有何明華、安迪生、布克禮（Harry A. Brunger，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顧問幹事）、李應標（聖公會牧師）、張綠蕓（聖公會牧師）等。<sup>49</sup>後來，又有馬敬全牧師（中華基督教會）、施玉麟牧師（聖公會）<sup>50</sup>、Rev. Sterling H. Whitener、Rev. E. Hague 等任教。<sup>51</sup>這些兼任教師，大多來自香港各主流教會，反映出崇基與教會間的密切關係。

作為基督教大學，其對基督教辦學精神又如何理解？龐德明牧師（聖公會）在 1953 年獲何明華邀請加入崇基，任神學、宗教教育系教授兼校牧及訓育主任（1954 年 8 月起更兼任副院長）。<sup>52</sup>他在週會崇拜中，向同學闡述基督教大學的目的。他期望同學有「獨立思想的能力，有批判的眼光，能夠運用所獲得的事實去發展新的思想出來」。同時，崇基也重視品格的培育，「倘若我們供給各位高深的學問而訓練不到你們的人格，我們教育的目的要算失敗了」。他更希望同學本著基督「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教訓，發展服務精神，對社會作出貢獻。那麼，上述的目的跟基督教有何關係？他承認，「這三個目的不是基督教大學所獨有的。任何一間有價值的大學，都是要達到這些目的，基督教同學與非基督教的同學的主要分別不在乎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而是在於尋求這些目的的方法和態度」。基督教的價值肯定「真理是由神所啟示」，以信仰來補充知識的不足。同時，也承認人不能單靠自己的努力來發展人格和服務精神，本「愛心和謙卑」來為社會服務。<sup>53</sup>

根據 1954 至 55 年的統計，全院 331 名同學中，基督徒及天主教徒分別有 177 人及 7

---

<sup>48</sup> 〈崇基校歌〉，崇基學院，

<http://www.ccc.cuhk.edu.hk/zh-tw/about-chung-chi/introduction/college-anthem-and-couplet/college-anthem>。

<sup>49</sup> 李應林：〈關於崇基學院〉，頁 1。

<sup>50</sup> 謝昭杰：〈校務報告〉，《校刊》，期 3（1953 年 1 月），頁 1。

<sup>51</sup> 謝昭杰：〈校務報告〉，《校刊》，期 4（1953 年 6 月），頁 1。

<sup>52</sup> 〈本院教職員略歷介紹〉，《校刊》，期 5（1954 年 1 月），頁 3。

<sup>53</sup> 龐德明牧師講，林澤華筆記：〈基督教大學的目的〉，《校刊》，期 5（1954 年 1 月），頁 11 至 12。

人，佔全體同學的 55.5%。<sup>54</sup>

## （二）建設期：第二任院長凌道揚（1955-1960）

隨著崇基在 1956 年底遷入馬料水，學院在硬件上漸見規模，學生人數也愈益增加。

1956 年 10 月，亞洲區基督教各大學校長在台灣舉行會議，凌道揚代表崇基出席，會後發表共同聲明，肯定基督教辦學的理念，乃對真理作自由之追求。此種追求，「不僅在乎理智上之了悟，而尤在於具備基督教之道德及精神上之價值」，藉此「作育具有基督徒品格之男女，兼備專門之技能，肯獻身為上帝及為人群服務」。<sup>55</sup>

在 1957 年開學典禮中，凌道揚再強調崇基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學」。教會學校的教育，「除了學術上的灌輸和研究之外，特別注重人格的培養和服務精神的訓練」。<sup>56</sup>他在第四屆畢業典禮中，亦希望畢業生在這所「基督教學府」中，受「基督教義之薰陶」，「獲得個人靈性體驗之價值」。<sup>57</sup>

1955 年加入崇基任宗教主任的芮陶菴（Andrew Roy），曾在金陵神學院、齊魯大學、華西大學、金陵大學任教，是一位資深的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他在 1959 年在《崇基校刊》撰文，闡述他對基督教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的理解。

芮指出，基督教教育並不是要將所有學科都統攝在基督教內，而是一種具基督教價值的自由教育（liberating education）。在這個意義架構（framework of meaning）內，學生得以學習及成長，並為其存在提供方向。因此，學生價值的培育是其中的關鍵。特別在香港，面對不同文化及價值（儒家、馬克思主義、西方物質主義、基督教）的交流與碰撞，基督徒知識分子的責任也更形艱巨。他期望，這是一種促成彼此完善而不是分歧（enrich rather than divide）的視野。基督教教育的責任，正是以錯綜複雜的神學構想來思考現實，嚴格地分析及理解當前的處境，進入其內在的結構，不以自己擁有真理自居，而是以基督神聖之愛來光照這個黑暗的世代。<sup>58</sup>

1959 年 11 月，第四屆基督教大學校長會議（Fourth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University

---

<sup>54</sup> 謝昭杰：〈校務報告〉，《校刊》，期 6（1955 年 1 月），頁 1。

<sup>55</sup> 〈亞洲區基督教各大學校長發表共同聲明全文〉，《校刊》，期 13（1957 年 12 月），封面裡頁。

<sup>56</sup> 〈凌院長開學典禮訓詞〉，《校刊》，期 15（1958 年 5 月），頁 1。

<sup>57</sup> 〈崇基第四屆畢業典禮院長演詞〉，《校刊》，期 16（1958 年 7 月），頁 2。

<sup>58</sup> Andrew T. Roy, "Christian Education," 《校刊》，期 19（1959 年 4 月），頁 14 至 18。

Presidents) 在崇基學院召開，芮陶菴在會上發表關於〈亞洲私立基督教大學的前途〉的報告，闡述了私立基督教大學與國家、社會及教會間的關係。其中關於與教會關係部分，他強調教會與基督教大學的功能並不一致，前者應服務後者，卻不是屈從於後者（*serving the Church, yet not subservient to it*）。他認為，基督教大學不應該由教會控制，也毋須要求全數教職員學生均為基督徒，並排斥一切非基督教的觀點。相反，基督教大學應鼓勵學術自由，容許不同思想的自由想像。同時，基督教也能開放地與不同信仰傳統交流對話。但基督教大學又不同於一般的世俗大學，基督教的課程及服務仍然是大學生活的一部分，讓基督的真理與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及其促成的寬恕、更新與力量，變得顯而易見。<sup>59</sup>

五十年代末，崇基全院學生已達 521 人。開設的學系達十個。<sup>60</sup>不過，有關基督徒學生比例的統計，自 1956 年起，即未有在校務概況中出現。當時，人生哲學仍是全院必須的科目，並仰賴香港教會牧者任特約講師。<sup>61</sup>至於崇基周會，仍以基督教為主題。1957 至 58 年的講員及講題如下：

講員	題目
凌道揚院長	「止於至善」的真諦
1234y7uytrewq 梁小初博士	馬禮遜牧師來華傳教 150 週年紀念
QWERTAsNN	世上的鹽
彭啟結女士	我們所信的真理
李樹培夫人	基督教大學教育的真義
孟居仁牧師	耶穌是誰？
潘頓牧師	正確的生活方式
德勞士牧師	基督徒的奉獻
齊恩良牧師	上帝對人類的挑戰
潘霖牧師	托咐了我們
郎家恆牧師	上帝之名
冒季美教授	聖誕的信息
杜文牧師	生命短而真理則永恆

<sup>59</sup> Andrew T. Roy, "The Future of Privat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Asia," 《校刊》，期 22（1960 年 1 月），頁 9 至 11。

<sup>60</sup> 〈院務概況〉，《校刊》，期 21（1959 年 10 月），頁 17。

<sup>61</sup> 〈院務概況〉，《校刊》，期 15（1958 年 5 月），頁 14。特約講師為：歷史之意義（郎家恆、龐德明）；中國哲學史（徐慶譽）；耶穌之生平（馬敬全）；耶穌之生平及教義（賈保羅、周郁晞、龐萬倫、史姆波、湯華德）。

譚志天牧師	我要寫甚麼？
黎士女士	在普世教會運動中之間的援助
史都嘉博士	世界基督教大學同盟
馬鴻述教授	人生止於至善的可能
凌道揚院長	「服務」兩字之要義
施同福牧師	基督徒對權柄的認識
嘉力勤博士	好意
汪長仁女士	那稱為基督的耶穌，你們怎樣對祂呢？
湯華德牧師	復活節的兩個神秘
崇基詩班	演唱「十架犧牲」
周夢秋牧師	主賜的平安
馬廷信牧師	你們說基督是誰？
江隨羅先生	今世代的學生
李揚安夫人	香港社會工作之鳥瞰
區德牧師	基督信仰與人生的隔膜
范思基教授	基督徒的責任
何中中女士	自我教育與心理衛生
趙孝源博士、策思特博士	朝鮮大學近貌和門基督教大學簡介
羅培生牧師	根
梁小初博士	為著甚麼而歡喜

表三：崇基週會 1957-58 <sup>62</sup>

為紀念華連牧師及李應林院長，1958年崇基學院將新校園內兩牧宿舍，命名為華連堂及應林堂。

### （三）迎向轉變：第三任校長容牧東（1960-1975）

進入六十年代，香港政府提出成立第二所大學的計劃，同時也向私立專上學校提供補

<sup>62</sup> 〈校務概況〉，《校刊》，期14（1958年2月），頁2；〈院務概況〉，《校刊》，期16（1958年7月），頁13。

助。有關香港高等教育的新政策，對崇基帶來重大影響。<sup>63</sup>1960年2月，凌道揚被聘為聯合書院院長，由芮陶菴暫任代院長一職（3月至7月）。這時，崇基的專任老師首次超過兼任，同時，也有崇真會及信義會加入董事會。<sup>64</sup>這一切，都意味著崇基的發展步入嶄新的階段。

早於芮氏就職時，即表達了崇基將面對的轉變及其挑戰。他預言，昔日簡單的校園將變為更複雜的公共學術生活。隨著崇基的「繁榮」及增加資源，或會吸引了更多人懷著不同動機加入。學院變得更公共及接受公帑補助，難免令其走向世俗化。校園將有更多新建築，或會令人關心建築物而失去彼此的關懷。他坦言崇基的「基督教大學」身分定位，將面對更大的困難。但他強調，基督教的意思絕非「教派」(sectarian)，崇基在重視基督教價值的同時，也尊重自由，並期望彼此尊重。不論是接受或反對基督教，也應該出於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不要因順從而成為基督徒，也不要因獨立而反對」。<sup>65</sup>

1960年8月，容啟東就職崇基校長（由院長改稱校長）時，強調崇基接受政府的補助，「不是說崇基將成為一間官辦的學校，或者政府想把崇基變成官立化，這完全不是的」。他重申，崇基在過去、現在及將來，均是自主的「私立學校」。就他理解，新成立的中文大學，將是「聯盟制度的大學」(Federated University)，「大學的各成員是容許保存他們本身的自主，而不予干涉的」。崇基的名字的意思是「崇奉基督」，表明她「必定延續過去十三間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優良傳統」，但同時「又必定在新環境和新需求下使到基督的精神在今日得到新的發揚」。<sup>66</sup>顯然，容所指的「新環境和新需求」，正是崇基面對接受政府補助後，帶來的各種變化。

神學及宗教系的范挪亞(Noah E. Fehl)，以「朝聖者」(pilgrim)及「難民」(refugee)的分別來為基督教大學作定位。他指出，兩者均是處於一種非定局的行旅(travellers)狀態，所不同的，是難民是離開家鄉，失去安全感，而朝聖者卻是朝向目的地的路上，旅途過程中所賦予的意義，超越了一般的安全感，甚至「當下」也成為「神聖」的。作為基督教大學的崇基正是走在這條朝聖的路上——處於一種既濟與未濟之間。仰賴上主的恩典，

<sup>63</sup> 〈容校長就職講詞——崇基的任務〉，《校刊》，期25（1960年12月），頁4。1960年1月，崇基獲教育司署通知，批准自1959年8月1日至1960年7月31日提供經常費及建築費的補助。〈院務概況〉，《校刊》，期23（1960年4月），頁23。

有關補助費，佔經常費的60-65%。《崇基十年》（香港：崇基學院，1961），頁2。Box 10, Folder 49, Sidney R. Anderson Papers (RG200),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鳴謝洪善丰提供資料。

<sup>64</sup> 〈崇基第六屆畢業典禮代院長演詞〉，《校刊》，期24（1960年7月），頁1。

<sup>65</sup> Andrew T. Roy, "The Acting President's Inaugural Address," 《校刊》，期23（1960年4月），頁2至3。

<sup>66</sup> 〈容校長就職講詞——崇基的任務〉，頁6。

成為一所朝聖者的大學 (university of pilgrims)，而不是難民的學院 (academy of refugees)。

67

那麼，面對新環境，「基督教大學」的理想，如何成為「朝聖者」的目標？這顯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62年，《崇基校刊》罕有地刊登了一篇編者語，題為〈崇基是否一所香港的學院〉(Is Chung Chi a Hong Kong College?)。顯然，編者語是要回應外界批對崇基的批評，指崇基是一所「難民學院」(Refugee College)、「美國學院」(American College)或「基督教學院」(Christian College)。針對其中「基督教」的部分，編者先指出，「基督教」的意思，並不代表崇基會以宗教理由來排斥任何學生。因為入學的要求完全以學業成績為考慮，而教職員的聘任也以專業資格為標準。再者，「基督教」的意思，代表崇基期望建構一種「基督教的生活態度」(a Christian attitude to life)。就是說，學生能掌握西方文明背後的希羅—基督教文明背景，並對基督教與哲學、歷史及科學的關係，有正確的認識。而這種基督教的態度，同時也包括了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理解。<sup>68</sup>

1962年4月13日，為配合發展為中文大學的成員書院，崇基校董會常務會正式通過設置文理兩學院。<sup>69</sup>4月29日，崇基禮拜堂舉行奉獻禮，由加拿大聯合教會代表 Dr. Leslie G. Kilborn 致辭，何明華會督祝禱。<sup>70</sup>這兩件重要的事件，在在體現出崇基的雙重身分及其挑戰——如何在一所聯邦制的公共大學中，發揮其基督教學院的角色？

其實，崇基加入中大，如何維持其基督教大學的身分，難免引起質疑，憂慮基督教辦學精神會否受影響。對此，容啟東校長致力於在中文大學體制內，實踐基督教精神。學院每年均舉行「宗教認識週」，邀請牧者主領宗教聚會。例如台灣著名的神學家周聯華，便先後在1964及66年獲邀到崇基，主領奮興佈道大會及宗教認識週專題。<sup>71</sup>《崇基校刊》也先後刊出多篇文章，討論與基督教精神相關的課題。例如1966年12月的校刊，便以〈世俗學術世界中的基督教臨在〉(Christian Presence in a Secular Academic World)為題作編者語。<sup>72</sup>1967年校慶時，編者語再次提醒，崇基不論在籌辦、目標及精神方面，均是一所基督教

---

<sup>67</sup> Noah E. Fehl, "Religion in the University," 《校刊》，期26（1961年4月），頁14。

<sup>68</sup> "Editorial: Is Chung Chi a Hong Kong College," 《校刊》，期30（1962年7月），頁1。

<sup>69</sup> 〈校務概況〉，《校刊》，期30（1962年7月），頁20。

<sup>70</sup> "Dedication of College Chapel," 《校刊》，期30（1962年7月），頁20。

<sup>71</sup> 周聯華講，趙毅之錄：〈基督的「完」「整」〉，《校刊》，期36（1964年8月），頁9至14。1966年3月，周聯華以「跟隨耶穌」作總題，主講了五次專題。〈校務報告〉，《校刊》，期40（1966年7月），頁5。

<sup>72</sup> "Editorial: Christian Presence in a Secular Academic World," 《校刊》，期41（1966年12月），頁1至3。

大學。<sup>73</sup>1969 年校慶日，主禮嘉賓是衛理公會羅愛徒會督（Bishop T. Otto Nall），講題是「Christian Plus in the Campus Community」。<sup>74</sup>哲學與宗教系的沈宣仁，也在校刊發表了〈基督徒群體在學術世界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the Academic World）。<sup>75</sup>1968 至 69 年，學院將原有的宗教與校園生活委員會改組為基督信仰與校園生活委員會，正是希望為崇基的宗教傳統，尋索在新的世俗化處境中作見證的可能。容啟東甚至指出：「雖然並未有見到答案，但最少正確的問題已經出現」。<sup>76</sup>可見，在加入中文大學後，崇基似乎更意識到自己的基督教大學身分。

#### 四、崇基學院與神學教育

上文闡述了崇基學院從創辦到加入中文大學期間，對「基督教大學」精神的理解。接著，我們將重點放在神學教育方面，整理神學教育在這些基督教大學的實踐與演變。

查大學與神學教育的結合，即或撇除歐美的悠久傳統不談，<sup>77</sup>就以中國近代教會發展歷程觀之，也非新鮮事物。1949 年前的中國神學院校，一直有大學神學教育與獨立神學院校的兩種形態。前者指附設於教會大學的神學院或神科，後者則泛指一般獨立神學院校。總計十三所在華教會大學中，設有神學教育的數目達七所。<sup>78</sup>

神學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教會訓練傳道同工。戰後是香港神學教育的「黃金時期」，在五十年代末期，全港共有十四所神學院校。<sup>79</sup>不過，根據一份五十年代初對東南亞神學教育作調查的報告書，香港的神學教育大多以宗派性為主，並且缺乏高等程度的神學訓練。<sup>80</sup>1953 年，衛理公會黃安素會督（Bishop Ralph A. Ward）指出，過去香港教會主要仰賴中

---

<sup>73</sup> “Editorial: Founders’ Day,” 《校刊》，期 43（1967 年 12 月），頁 2。

<sup>74</sup> Bishop T. Otto Nall, “Christian Plus in the Campus Community,” 《校刊》，期 47（1969），頁 11 至 14。

<sup>75</sup> Philip Shen, “The Role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the Academic World,” 《校刊》，期 41（1966 年 12 月），頁 17 至 24、14。

<sup>76</sup>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September 1, 1967-August 31, 1968,” 《校刊》，期 47（1969），頁 7。

<sup>77</sup> Joseph Mitsuo Kitagawa ed., *Religious Studies, Theological Studies, and the University-Divinity School*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2).

<sup>78</sup> 七所設有神學教育的教會大學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華西協和大學宗教學院、齊魯大學神學院、聖約翰大學神科、滬江大學神科、華中大學神科及嶺南大學協和神學院。

<sup>79</sup> 伯特利神學院、信義神學院、神召聖經學校、廣州聖經學校、建道聖經學院、調景嶺協同聖經學院（1956 年結束）、調景嶺宣道聖經學院（1954 年併入建道）、浸信神道學院、香港聖經學院、信義聖經學院、中華基督教會女宣教師訓練學校、香港協和神學院、樂育神學院、協同神學院、遠東宣教會中台聖經學院香港分院。到六十年代，又新增國際神學院、中華神學院、浸信會聖經學院、海外神學院、天人神學院、真道聖經學院等。參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導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頁 122 至 132。

<sup>80</sup> *The Anderson-Smith Report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Especially as it Relates to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for the Christian Ministry: the Report of a Survey Commission, 1951-1952* (New York: Board of Founders, 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1952), 66-67.

國的神學院校來培訓人才，但在 1950 年後已經無法進行。他對當時香港的神學院校的情況並不滿意，並期望崇基學院可以仿效昔日中國宗派間合作的協和式神學院校模式（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開設相關的神學系。<sup>81</sup>

### （一）1951 至 1959 年：從人生哲學到宗教教育

那麼，作為香港第一所成立的基督教大學，又如何發展高等神學教育，以服事香港教會？

創校初期，崇基並沒有開設神學教育，正如上文指出，崇基本基督教精神辦學。其中「人生哲學」一科，悉由傳教士及華人牧者任教。該科內容，涉及了耶穌生平與教訓，以及聖經的內容及意義等。<sup>82</sup>李應林院長指出，「人生哲學」這科，可與將來的神學訓練銜接。<sup>83</sup>

不過，在崇基的創辦者中，對於神學教育一直沒有或忘。何明華會督是崇基的重要奠基者，對這些基督教大學的建立建樹良多。他在 1954 年 3 月為崇基使用的霍約瑟堂奉獻禮致辭時，便表達了將來成立崇基神學院的願望。<sup>84</sup>

1956 年，崇基正式開設基督教教育課程。原有的社會教育系（Sociology and Education）改組為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學系（Religious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其中新增的宗教教育，就是為香港各基督教小學的宗教科教員以及教會主日學教員，提供晚間進修機會。課程與香港宗教教師協會合作，教授「新約聖經」、「舊約聖經」及「教學法」。同時，這三個課程又成為宗教教育與社會工作學系學生的必修科。<sup>85</sup> 1957 年起，又增設第一世紀基督教學及基督教倫理學兩科。<sup>86</sup>

1956 年 9 月，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學系有學生 10 人（其中三年級 8 人，一年級 2 人）。<sup>87</sup>由於宗教教育是 1956 年始新增，故三年級的學生，應屬原有的社會教育系。該年開設的宗教教育科目為：宗教教育（馬鴻述）、宗教史（杜文牧師 Rev. R. Trueman）。<sup>88</sup> 1957 年 9

---

<sup>81</sup> Ralph A. Ward, "Methodist Works in Hong Kong and Its Setting," September 1953, 1459-3-3-13, HK Conference (Provisional), the United Methodist Archives and History Centre, Drew University. 鳴謝洪善丰提供資料。

<sup>82</sup> 謝昭杰：〈校務報告〉，《校刊》，期 5（1954 年 1 月），頁 2。

<sup>83</sup>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Chung Chi College. 1951-52," 2.

<sup>84</sup> 何明華：〈崇基學院——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霍約瑟堂奉獻典禮演講詞〉，頁 5；"Chung Chi College, Opening Service held at New Premises, Address by Bishop Hall."

<sup>85</sup> 〈宗教教育及社會服務學系，宗教推廣教育課程首次開辦〉，《校刊》，期 9（1956 年 11 月），頁 13。

<sup>86</sup> 〈校務報告〉，《校刊》，期 10（1957 年 3 月），頁 14。

<sup>87</sup> 〈校務報告〉，《校刊》，期 9（1956 年 11 月），頁 14。

<sup>88</sup> 〈校務報告〉，《校刊》，期 12（1957 年 9 月），頁 16。

月，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已增至 52 人，<sup>89</sup>下學期新增了 5 位「不列級」學生。至 1958 年 9 月，全系學生增至 75 人（含「不列級」5 人）。<sup>90</sup>所謂「不列級」學生，應指宗教教育課程的晚間課程同學。

1958 年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學系 14 名畢業生中，有兩人繼續進修神學（赴美及到香港浸信會神學院）。<sup>91</sup>第六屆（1960）宗教教育學系畢業生 4 人中，有 3 人繼續在神學系進修，另 1 人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婦女部任助理幹事。第七屆（1961）宗教教育學系畢業生有 4 人，有三人分別在崇基、印度及美國進修神學。<sup>92</sup>

打從崇基創校以來，第一至第七屆的畢業生（合共 459 人），其中有 7 人（1.6%）在香港「研究神學」，另有 11 人（2.3%）從事「宗教工作」。<sup>93</sup>

## （二）1959 至 1963 年：神學及宗教教育學系

1958 年 7 月，崇基校董會（Board of Governors）決定成立神學及宗教教育學系，目的是希望更好地回應香港教會的需要，為教會訓練人材。有關神學教育的預算，乃由本地教會及差會團體捐獻，獨立於崇基學院的經常預算。崇基學院委任一顧問委辦（Advisory Committee），為神學系的課程及行政提供指導。由衛理公會的安迪生（S. R. Anderson）博士任主席。<sup>94</sup>

凌道揚院長在 1959 年的第五屆畢業禮上，正式宣佈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學系分成為兩個獨立學系：神學及宗教教育學系及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他形容，此乃「本年度本校另一大措施」。<sup>95</sup>新成立的神學及宗教教育系由湯華德牧師（W. H. Tonge）任代理系主任。湯屬加拿大聯合教會，派駐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按原來構想，系主任一職意屬華人出任，但在未找到合適人選前，由湯氏代理。<sup>96</sup>

課程方面，其一是五年制的神學士課程（B. Th.），包括了兩年的大學課程及三年的神學訓練。同學亦可在完成四年的大學課程後，再修讀兩年的神學課程，如此即同時獲頒文

---

<sup>89</sup> 〈校務報告〉，《校刊》，期 13（1957 年 12 月），頁 2。

<sup>90</sup> 〈校務報告〉，《校刊》，期 18（1958 年 1 月），頁 18。

<sup>91</sup> 〈本院第五屆畢業同學升學就業調查表〉，《校刊》，期 21（1959 年 10 月），頁 27 至 28。

<sup>92</sup> 〈本校歷屆畢業同學深造或就業近況一覽〉，《校刊》，期 30（1962 年 7 月），頁 39。

<sup>93</sup> 〈校務概況〉，《校刊》，期 28（1961 年 10 月），頁 14。

<sup>94</sup> W. H. Tonge, "Another Step Forward," 5.

<sup>95</sup> 〈崇基第五屆畢業典禮凌院長演詞〉，《校刊》，期 20（1959 年 7 月），頁 1。

<sup>96</sup> W. H. Tonge, "Another Step Forward," 《校刊》，期 20（1959 年 7 月），頁 5 至 6。

學士 (B.A.) 及神學士 (B. Th.) 雙學位。其二，是以宗教教育為主，課程內容包括兩年的大學課程及兩年的宗教教育課程。畢業生可以在各教會學校任教，或是在教會從事宗教教育工作。<sup>97</sup>此外，人生哲學一科，亦由神學及宗教教育學系負責，以體現神學系對學院的貢獻與服務。<sup>98</sup>

崇基學院神學及宗教教育系開創時，崇基學院院長凌道揚與該系委員會主席安迪生致函各教會，呼籲選派學生來院就讀。<sup>99</sup>當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對崇基神學的支持甚大，於 1959 年通過派五人入讀，又在財政上支持崇基，並代向各外國教會申請資助。<sup>100</sup>

神學及宗教教育學系，在整個崇基學院中，是規模最小的學系。不論在老師或學生的人數上均如是。老師方面，在 1959 年創系時，只有三位專職老師：湯華德（代理系主任）、范挪亞、馬鴻述，另有兼任 3 人（周郁晞、杜文、芮陶菴）。<sup>101</sup>當時衛理公會也計劃差派一位全職老師至神學學系任教。<sup>102</sup>學生方面，筆者整理了 1959 至 62 年間的校務概況，可見各年學生人數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不列級 ／其他	合共
1959 年 10 月	0	3	3	4	1	11
1960 年 4 月	1	0	1	4	8	14
1961 年 4 月	1	0	2	4	7	14
1961 年 10 月	0	1	2	1	9	13
1962 年 7 月	0	1	2	1	8	12
1962 年 10 月	0	1	1	2		4

表四：神學及宗教教育學系學生 1959-62 <sup>103</sup>

<sup>97</sup> W. H. Tonge, "Another Step Forward," 6.

<sup>98</sup> "Department of Theology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校刊》，期 28 (1961 年 10 月)，頁 12。

<sup>99</sup> 〈崇基學院來函〉，《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期 24 (1959 年 5 月)，頁 28。

<sup>100</sup> 〈一九五八年度事工報告書〉，《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期 24 (1959 年 5 月)，頁 18。

<sup>101</sup> 〈校務報告〉，《崇基校刊》，期 21 (1959 年 10 月)，頁 19。

<sup>102</sup> S. R. Anderson, "A Forward Look: Tentative Draft of Plan to be Submitted to Board of Mission," 1960, 4. Box 10, Folder 49, Sidney R. Anderson Papers (RG200),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鳴謝洪善手提供資料。

<sup>103</sup> 〈校務概況〉，《校刊》，期 21 (1959 年 10 月)，頁 17；〈院務概況〉，《校刊》，期 23 (1960 年 4 月)，頁 17；〈校務概況〉，《校刊》，期 26 (1958 年 2 月)，頁 2；〈院務概況〉，《校刊》，期 28 (1961

從表四可見，神學及宗教教育的收生情況一直處於較低水平。主要原因，相信是由於崇基學院接受政府津貼後改為統一招生，特別對英文的水平要求提高，對部分英文程度未達標而又有志獻身者，構成一定困難。<sup>104</sup>而當時神學及宗教教育課程，又以英語講授。<sup>105</sup>環顧同期香港大多數神學院校，仍屬聖經學校程度，鮮有以高中畢業為入學基本條件。附設於基督教高等學府的神學系，在收生方面的標準，實與整體教會獻身者的情有所落差。就以支持崇基的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為例，便在 1959 年將原有的女宣教師學校改組為香港神學院，供高中畢業而未能考入崇基學院就讀者而設。不過，該院學生亦可在崇基修讀指定的神學科目。<sup>106</sup>

### （三）1963 至 1968 年：崇基神學院

1962 年 7 月，神學及宗教教育學系在報告中，指學院計劃另設隸屬於崇基的神學院（School of Theology affiliated with Chung Chi College），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回應香港教會的牧職訓練需要。蓋此舉可以讓神學院在入學要求上，有別於崇基學院其他學系，並且開設更多實踐科目。同時，神學院繼續與崇基維持關係，又可享受與改組後的宗教知識與哲學系（Department of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Philosophy）合作的關係。按初步構想，神學院的課程設計，分為兩年制的大學預備課程，以及兩至三年制的神學課程。而新的宗教知識主修，仍是以基督教為主，涉及聖經、歷史及神學，為那些有志在大學追求神學研究者而設。畢業生可以在中學教授宗教科目，以及進一步在海外進修神學高等學位，成為東南亞地區大學或神學院的師資。<sup>107</sup>

1963 年 2 月，神學及宗教教育系正式獲教育司署批准易名為宗教及哲學學系，仍由范挪亞任系主任。<sup>108</sup>7 月，《崇基校刊》刊登了關於崇基神學院的消息：

本校附屬之崇基神學院，將於本年九月招收新生，凡有志獻身傳道及教會工作者，均歡迎投考。入學資格須具有立案高級中畢業業，並經所屬教會當局之推薦者，報名投考之新生，不必持有會考及格證書及參加補助專上學校統一入學試；惟未經統

---

年 10 月），頁 16；〈校務概況〉，《校刊》，期 30（1962 年 27），頁 20；〈院務概況〉，《校刊》，期 31（1962 年 10 月），頁 22。

「不列級」指五、六年級的神學系學生。而 1961 年 10 月中，9 位不列級／其他，則包括了 6 位五、六年級，及 3 位旁聽。

<sup>104</sup> 汪彼得：〈一九五八年度事工報告書〉，《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期 38（1960 年 7 月），頁 18。

<sup>105</sup> 〈校務概況〉，《校刊》，期 21（1959 年 10 月），頁 17。

<sup>106</sup> 〈香港神學院〉，《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期 26（1959 年 7 月），頁 15。

<sup>107</sup> “Department of Theology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校刊》，期 30（1962 年 7 月），頁 27。

<sup>108</sup> 〈校務概況〉，《校刊》，期 32（1963 年 3 月），頁 13。

一入學試及格者，將不得在即將成立之中文大學註冊選課，而僅能在神學院攻讀。統一入學考試日期為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如不能投考統一入學試者，可參加神學院考試。日期另定之。<sup>109</sup>

為何神學及宗教研究學系在 1959 成立，僅短短四年便作出那麼重大的改組？一方面，正如前述，神學系屬於崇基學院文學院，不少教會有志從事傳道工不一定能符合其入學要求。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忽視 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立，作為中大成員書院，崇基學院面對進一步的體制轉變。

中文大學是香港政府成立的第二所公立大學，雖然在體制上為聯邦制，三所創校成員書院具有自主，但畢竟神學教育與公立大學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崇基神學院在體制上獨立於中大，但仍然附屬於崇基學院，既能尊重崇基的基督教傳統，也讓神學教育在新模式下有較更大的自主，未嘗不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安排。從《崇基校刊》可見，自 1963 年起，崇基神學院的消息並不在「學系」報告內刊載，而是屬於「校務報告」。<sup>110</sup>在 1967 及 68 年的《崇基校刊》內，亦有單獨的崇基神學院的報告，並註明此乃「附屬於學院」(Chung Chi Theological Seminary Affiliated with the College)。<sup>111</sup>容啟東校長在學院年報中，均有關於崇基神學院的報告，在在說明神學院與崇基的密切關係。<sup>112</sup>

崇基神學院的院長由崇基學院院長容啟東兼任。成立之初，教員包括：趙友仁 (Paul Jefferies, 英國循道會傳教士, 兼神學院教務長[Dean])、曾榮輝 (崇真會樂育神學院)、古愛華 (W. M. Gluer, 信義神學院)、樂蘭馨 (Margaret Lawrence, Churches of Christ-Disciples)、戴郇瑾 (聖公會) 及施其樂 (Carl Smith)。<sup>113</sup> 1966 年 6 月，趙友仁辭職返英，神學院董事會 (Seminary Council) 委任芮陶菴接任教務長一職，為期兩年。<sup>114</sup>

當時，神學院在鄰近的赤泥坪村租賃村屋，作為學生宿舍之用。<sup>115</sup>1964 年，崇基學院

---

<sup>109</sup> 〈校務概況〉，《校刊》，期 33 (1963 年 7 月)，頁 25。

<sup>110</sup> “College News,” 《校刊》，期 34 (1963 年 12 月)，頁 27；“College News,” 《校刊》，期 36 (1964 年 8 月)，頁 29；〈校務報告〉，《校刊》，期 36 (1966 年 12 月)，頁 36。

<sup>111</sup> “Chung Chi Theological Seminary Affiliated with the College Report, 30<sup>th</sup> of September, 1967,” 《校刊》，期 43 (1967 年 12 月)，頁 59；“Chung Chi Theological Seminary Affiliated with the College Report, May 20, 1967,” 《校刊》，期 44 (1968 年 6 月)，頁 35。

<sup>112</sup>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for 1965/66,” 《校刊》，期 41 (1966 年 12 月)，頁 79 至 80；“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September 1, 1967- August 31, 1968,” 《校刊》，期 45 (1968 年 12 月)，頁 43。

<sup>113</sup> “College News: Chung Chi Theological Seminary,” 《校刊》，期 34 (1963 年 12 月)，頁 27。

<sup>114</sup>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for 1965/66,” 79。

<sup>115</sup>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for 1965/66,” 79。

正式向政府申請，在禮拜堂西北的山谷為神學院興建校舍（包括學生宿舍、老師宿舍、圖書館及課室），預計支出為港幣 40 萬元。<sup>116</sup>1966 年 7 月中大校董會通過有關選址，並預計在 1967 年 1 月動工。<sup>117</sup>惟後來，有關地盤平整至 1967 年才完成，預計延至 1968 年始動工。

118

學生人數方面，崇基神學院在 1963 年 9 月開學時，錄取了 6 名全時間新生，當時全院合共 7 名全時間學生及 2 名兼讀學生。<sup>119</sup>1965 至 66 年，全院合共 15 名學生，其中 2 人分別來自馬來西亞（砂勝越）及印尼。<sup>120</sup>1966 年，學生為 13 人。<sup>121</sup>1967 至 68 年度，則有學生 22 人（其中 16 人為全時間），分別來自衛理公會、潮語浸信會、崇真會、沙巴巴色會、及聖公會。<sup>122</sup>

1968 年 6 月 22 日，崇基神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授憑典禮。首屆畢業生共 6 人：陳先鵬、陳運生、祝維剛、李鼎新、雷鎮昇及王國雄。<sup>123</sup>雖然神學院在 1968 年 9 月改組（下文），但 1969 年仍以「崇基神學院」名義，舉辦了第二屆的畢業禮。<sup>124</sup>

1967 年，神學院組成課程改革委員會，成員包括廖新民（Paul Newman）、戴智民（Richard Deutsch）、施其樂、李景雄及沈宣仁。<sup>125</sup>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基督教會的香港神學院及崇真會主辦的樂育神學院，先後於 1963 及 1966 年併入崇基神學院。

#### （四）1968：公立大學體制內的崇基神學組

1967 年，崇基學院召開多次會議，決定將崇基神學院重新轉移回到學院及中文大學體

---

<sup>116</sup> “College News,” 《校刊》，期 36（1964 年 8 月），頁 29。

<sup>117</sup>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for 1965/66,” 80.

<sup>118</sup>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September 1, 1967- August 31, 1968,” 19.

<sup>119</sup> “College News: Chung Chi Theological Seminary,” 《校刊》，期 34（1963 年 12 月），頁 27。

<sup>120</sup>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for 1965/66,” 79.

<sup>121</sup> 〈校務報告〉，《校刊》，期 41（1966 年 12 月），頁 36。

<sup>122</sup>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September 1, 1967- August 31, 1968,” 43.

<sup>123</sup> 《崇基神學院第一屆畢業授憑典禮》，1968 年 6 月 22 日。Carl Smith Collection, Archives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K Baptist University. 〈本院第七屆畢業同學升學就業調查表〉，《校刊》，期 28（1961 年 10 月），頁 29。〈崇基神學院首屆畢業禮〉，《工商日報》，1968 年 6 月 23 日。“Seminary’s First Graduates,” *SCMP* June 23, 1968.

<sup>124</sup> 〈崇基神學院今日畢業禮〉，《工商日報》，1969 年 11 月 30 日。畢業生包括：陳洽生、鄭世豪、何靖國、梁光、伍福盛、岑白堅、曾建和、王家榮八人。

<sup>125</sup> “Chung Chi Theological Seminary, Affiliated with the College, Report, 30<sup>th</sup> September, 1967,” 《校刊》，期 43（1967 年 12 月），頁 59。

制內。新的模式是神學院與宗教知識及哲學學系合併為哲學及宗教學系，而神學教育則歸系內的神學組（Theology Division）負責。一方面，神學組是大學的學術單位，但另一方面，其財政卻不接受政府公帑而獨立運作，由崇基學院委任神學校董會（Theological Council）負責管理。<sup>126</sup>

有關改組，先後獲神學院董事會、崇基校董會及中文大學行政與學術計劃委員會通過。同時，又在哲學及宗教學系內，增設循大學入學途徑的文學士（主修神學）。完成四年後，可再進修兩年為牧職而設的實踐牧養科及實習。同時，神學組亦可接受25歲以上的特別生，修讀非學科課程。<sup>127</sup>

首任神學組主任為廖新民（Paul W. Newman），他是加拿大聯合教會及中華基督教會的牧師，同時兼任哲學及宗教學系的系主任。同時，原屬澳洲浸信會傳道會的歐禮彰（John W. Olley），也獲美國浸禮會派入神學組任兼職教師。<sup>128</sup>1969年11月，崇基神學樓落成，神學組正式遷入。1968年，有8位新生（其中2位是特別生）。<sup>129</sup>1970年，主修神學的本科生可以副修其他學科。<sup>130</sup>

七十年代，隨著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遷至馬料水，香港中文大學新校園漸見規模，崇基學院校園內的神學組及神學樓，進一步與香港第二所公立大學連結起來。

1971年的《崇基校刊》對崇基神學組的介紹如下：

依據中文大學與崇基學院之協定，神學組之財政，完全獨立，由派有代表參加崇基神學教育校董會之教會及差會全力支持。此校董會有權監督崇基所辦之神學教育。神學組之財政，雖然獨立，但在學術課程上則與中文大學合為整體。故學生可在此世界公認之非宗教的大學獲取神學學位。此種制度，在東南亞而言，乃屬創辦。

神學組既為大學之一部份，其學生得在其他學系選修或副修各種科目，如英文、國文、社會科學及音樂等，俱為神學組學生所喜選之科目。神學組之員生，均可充分使用學院及大學之圖書館及分享體育、醫藥、牙醫及社交等各項設備。

---

<sup>126</sup>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September 1, 1967-August 31, 1968,” 43.

<sup>127</sup> “Chung Chi Theological Seminary Affiliated with the College, Report, May 20, 1968,” 《校刊》，期44（1968年6月），頁35。

<sup>128</sup> “President’s Annual Report, September 1, 1967-August 31, 1968,” 43.

<sup>129</sup>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校刊》，期47（1969），頁39。

<sup>130</sup>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Theology Division,” 《校刊》，期49（1970年12月），頁28。

尤為重要者，厥為神學組師生得與大學其他部門人士彼此交換意見，激發學術探討。故神學組歡迎其他學系學生選修神學科目，並鼓勵神學組學生參加學院之一般活動。神學組教職員在學院之活動及職務方面，亦各其責職。<sup>131</sup>

在課程方面，當時神學組已推行兩軌制的學位：凡有志獻身為教會事業者，經中大入學試資，可主修神學，完成四年學習並獲頒文學士後，再修讀第五、六年課程，獲取其他學位。如未獲大學入學試及格的特別生，可修讀五年制的「簡縮課程」，獲取東南亞神學院聯合會所頒授的神學士（B.D.）。如具有本科學士學位者，亦可在神學組進修二年或三年的高級課程。同時，神學組又與東南亞神學研究院合作，開辦神學碩士課程。<sup>132</sup>

七十年代初，支持崇基神學組的宗派包括：聖公會、循道公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崇真會、潮語浸信會、衛理公會。上述六個宗派均派代表參加神學校董會。<sup>133</sup>

1973年，神學組在中大研究院新設神道學碩士（M.Div.）課程，<sup>134</sup>1975年首屆畢業生共4人。同年，神學組招生了9名新生（其中4人為神道學碩士），破了歷年最多新生入學的紀錄。<sup>135</sup>

## 五、代結語：公共大學體制下的崇基神學教育

### （一）中文大學改制與崇基

1976年是崇基學院創校25周年。不過，在迎向金禧校慶之際，卻傳來香港政府要求中文大學改變創校時的「聯邦制」。面對是次重大的體制改變，崇基學院能否維持基督教傳統，再次成為眾人的關注。

中文大學創校時採用「聯邦制」，三所書院具有高度的自主。但進入七十年代，有關「聯邦制」導致大學架構重疊的爭議不絕。1975年11月，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 MacLehose）委任以富爾敦（John S. Fulton）勳爵為主席的校外委員會，檢討大學及其成員書院的關係。委員會於1976年3月發表報告書，建議由大學本部負責教務及發展方針、財務管理、大學入學試、聘請教職員、擬訂課程、舉行考試及頒授學位。《富爾敦報告書》將行政及發展權

---

<sup>131</sup> 〈崇基神學組簡介〉，《校刊》，期50（1971年6月），頁35。

<sup>132</sup> 〈崇基神學組簡介〉，頁36。

<sup>133</sup> 〈崇基神學組簡介〉，頁36。

<sup>134</sup> “Theology Divisio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校刊》，期58（1975年6月），頁39。

<sup>135</sup> “Departmental News,”《校刊》，期59（1975年12月），頁36。

力集中大學本部，成為中大發展史上，具深遠影響的事件。<sup>136</sup>

由於中大改制是以中央集權為目標，故不少教會人士紛紛憂慮其對崇基的影響。有意見指「一旦採用中央集權制，崇基學院是否仍是一間基督教大學？」<sup>137</sup>對於「大學吞了學院」，論者進一步擔心「神學樓」及「禮拜堂」的角色。<sup>138</sup>聖公會白約翰（Gilbert Baker）會督更公開撰文，表達改制對崇基作為基督教大學的影響。<sup>139</sup>而崇基校董會也對改制持保留態度。<sup>140</sup>容啟東接受訪問時，更批評改制乃香港政府「直接插手干預中大內政」。<sup>141</sup>

在一片爭議聲中，香港政府接納《富爾敦報告書》建議，並於1976年12月22日，在立法局通過中文大學新條例與規程。對此，錢穆及唐君毅等九位新亞書院校董集體辭職。<sup>142</sup>時為崇基學院新任院長的譚尚渭院長特致公開函，澄清新法案「對崇基之基督教傳統精神及神學教育已有妥善安排，在新法案之下，崇基仍為基督教學院，宗教活動及神學教育仍得繼續進行，不受影響」。譚特別引述了法案中對崇基學院校董會的責權：

- （甲）經行政及計劃委員會向大學校董會提議神學組（或在大學用接續該組之神學教育部門）所有教席之聘任，包括神學組主任（或同等職位）及神學宿舍舍監之聘任；
- （乙）自行籌款以充神學教育用途，包括神學樓之保養；
- （丙）委全及聘用校牧；
- （丁）將有關神學教育事務之主要政策通告大學教務會；

同時，校董會亦得委出一個神學董事會，授予權力執行本段所列出校董會之任務與職責。

最後他在信中重申，「經過修改後的中大法案，對各項與學院有關的問題，都有相當慎密的

---

<sup>136</sup> 〈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中大五十年，<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7472>。

<sup>137</sup> 阿摩司：〈中大果然改制〉，《基督教週報》，期633（1976年10月10日）。

<sup>138</sup> 阿摩司：〈再談中大改制與神學樓〉，《基督教週報》，期637（1976年11月7日）。另Peter K. H. Lee, "Fate of Chapel and Theology Building," *SCMP* Oct. 29, 1976.

<sup>139</sup> Gilbert Baker, "Govt Bill and Chung Chi's Future," *SCMP* Oct. 23, 1976.

<sup>140</sup> "College to Reject the University Bill," *SCMP* Oct. 23, 1976.

<sup>141</sup> 〈容啟東校長訪問記〉，《校刊》，期61（1976年12月），頁18。

<sup>142</sup> 〈含糊曖昧的中大理念、朝三暮四的大學體制〉，中大五十年，<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7472>。

安排。我們希望在師生及員工的努力下，能夠將基督的精神，更為發揚光大」。<sup>143</sup>

譚尚渭就職崇基校長時，正值改制風潮之中。他在就職演辭中，指出隨著富爾敦報告書的發表，學院雖「正面臨新的變化」，但始終是「要保持基督教理想的辦學精神，保持崇基為一崇奉基督的學府」。<sup>144</sup>在是期《校刊》中，更重刊了何明華會督〈崇基學院的創立〉及凌道揚校長“*How the College Began*”一文，<sup>145</sup>藉此重申崇基創校所承傳的基督教傳統。

1977年，崇基校慶感恩崇拜，特別邀請了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主禮，李在演辭中，指出他雖然「不是信奉基督教的教徒」，卻也不是「道地的異教徒」。因為他從少也在教會學校接受教育（廣州培英學校及南京金陵大學），故他充分肯定教會學校對近代中國教育發展的貢獻。不過，李特別分享了兩件他在教會學校中感到「感觸」之事。其一，是小學的校長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反對學生在安息日作任何運動，他認為此乃「不近情理之事」。其二，是他在教會學校中，見到「傳教士老師」與「學者」身分間的矛盾，他認為以沒有專業訓練的人任教是一種「失策」，有違高等教育的目標。<sup>146</sup>這兩件事未嘗不反映出李氏在肯定對教會辦學的同時，對基督教本位的不滿及批評。

作為中大創校校長，他如何理解崇基的基督教特色及其貢獻？他指出：「崇基的重要性和貢獻絕不是教會中小學的延續，也不止是本身有教堂、神學院、和神學的課程；崇基的地位主要在中文大學發揮積極的作用和影響。」李卓敏重申，崇基必須對中文大學的發展作出貢獻。他期望崇基「不用怕改」，保持基督教的「人類的同情心」（*humanity*）與「虛懷」（*humility*）精神，重視人人平等，「在中文大學發揮基督教精神」。<sup>147</sup>

## （二）大學、基督教、神學教育的張力

從上文可見，崇基學院自1951年秉基督教精神創校以來，歷經變革與改制：從草創到建立規模；從私立基督教大學到公立大學的基督教學院；從聯邦制到中央集權制下的書院。在這個過程中，到底甚麼是基督教大學？如何實踐基督教精神？一直成為不同年代崇基人的探索與反省。與此同時，崇基又積極探索如何在高等神學教育上服事教會。

---

<sup>143</sup> 〈崇基學院來函本報申明，修改大文大學法案，無損基督傳統精神〉，《基督教週報》，期638（1977年1月23日）；另〈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致各界人士的一封公開信〉，《港澳教聲》，期280（1977年1月31日）。

<sup>144</sup> 〈譚尚渭校長就職演講辭〉，《校刊》，期61（1976年12月），頁5。

<sup>145</sup> 何明華：〈崇基學院的創立〉，《校刊》，期61（1976年12月），頁8至9；D. Y. Lin, “*How the College Began*,” 《校刊》，期61（1976年12月），頁10至12。

<sup>146</sup> 〈崇基學院慶祝二十六週年校慶感恩崇拜演辭〉，《校刊》，期62/63（1977），頁3。

<sup>147</sup> 〈崇基學院慶祝二十六週年校慶感恩崇拜演辭〉，頁3至4。

關於基督教大學的定位，早於 1961 年 5 月，亞洲區基督教各大學校長在韓國舉行第五屆年會所發表了共同聲明中，不諱言其中的張力：「基督教大學絕不應該因為要的是大學，而減少了基督教的成份；但更不應該因為要的是基督教，而減少了大學的成份。」<sup>148</sup>這種張力，相信到崇基加入中大，特別是經歷中大改制後，更為顯著。隨著大學教育的發展，崇基如何承繼創校的基督教精神，也面對愈來愈大的挑戰。

在高等神學教育方面，崇基也建立了獨特的模式。中國著名神學家趙紫宸，擔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多年，一直心繫中國神學教育的發展。他曾對比大學神學院與獨立神學院的優劣，指出：「獨立的神學有長處，即能專心而虔誠；有短處，即在卑狹而僵乾。若能與大學聯為一氣，或與文化研究機關相與交融，而又保持神學院所特有的宗教精神，那末貢獻就可廣大而悠遠了。」<sup>149</sup>趙氏所言，正好道出大學與神學教育間的「吊詭」(paradoxical)。

早於 1960 年時，芮陶菴對基督教大學的神學教育寄予厚望。他相信，最理想的神學教育，是與大學維持著一種「半獨立卻密切的關係」(semi-independent but intimate relationship)。<sup>150</sup>他的主張，可說與趙紫宸有所呼應。從上文可見，從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學系到神學與宗教教育系；從崇基神學院到崇基神學組，崇基都沿著這個方向探索。同樣，隨著大學教育的急劇轉型，崇基神學教育如何在崇基學院及各支持教會的支持下實踐使命，並維持與中文大學間獨特的關係，也是充滿挑戰的。

附記：1976 年，崇基宗教知識及哲學系易名宗教及哲學系。<sup>151</sup>中大改制後，崇基宗哲系的哲學組在 1978 年與新亞哲學系合併為中大哲學系。而宗教組則易名中大宗教系，崇基神學組仍為宗教系的學術單位。2004 年，宗教系易名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崇基神學組易名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下轄文化研究、宗教研究及神學三個單位。其中神學組即崇基學院神學院。

---

<sup>148</sup> 〈亞洲區基督教各大學校長發表第三次共同聲明全文〉，《校刊》，期 27（1961 年 7 月），封面裡頁。

<sup>149</sup> 趙紫宸：〈我對中國高等神學教育的夢想〉，《真理與生命》，卷 8 期 7（1934 年 12 月）頁 347。

<sup>150</sup> Andrew T. Roy, "The Future of Privat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Asia," 10.

<sup>151</sup> "Departmental News," 《校刊》，期 60（1976 年 10 月），頁 56。